

五四浪潮中女子教育的觉醒：性别平等追求与文化认同重构

许艳丽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6; 1763685483@qq.com)

摘 要: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事件,对女性教育和文化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不仅推动了女性教育权的普及,还促进了女性角色认同的转型,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从传统的“女德”教育到现代学术与职业教育的转型,为女性自我认知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基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性别平等思想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与传统儒家文化中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存在激烈对立。在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平衡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张力成为关键问题。五四运动期间的文化冲突,不仅表现在教育政策和课程设置上,也影响了社会对女性教育的接受度与认同。其中性别平等理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对于揭示女性教育在这一历史转型中的文化认同变迁具有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对女性教育的推动不仅改变了教育体系本身,还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文化身份的重塑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五四运动;女子教育;性别平等;文化冲突;文化认同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体系与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女性教育的影响尤为显著。运动不仅是一次政治上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深刻反思的契机。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性别平等思想,打破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尤其在教育领域。五四运动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与科学,提倡平等和进步,这为中国的女性解放、性别平等与教育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23]。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教育,长时间受到“男尊女卑”和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制约,女性通常被排除在正式教育体系之外。女子教育不仅限于家庭内的道德教化与家务技能培养,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性的教育机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有着严苛的限制[24]。随着五四运动的思想潮流的推动,这一传统局面逐渐被打破。在新的文化理念推动下,性别平等的思想逐渐传播,并开始渗透到教育领域。五四运动提倡的“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思想,尤其影响了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女性教育运动的倡导者,推动了女性教育观念的变革[21]。然而,这一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织下,女子教育的改革伴随着激烈的文化冲突和观念碰撞。

五四运动时期,性别平等的思想首次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得到系统的提出和广泛的传播。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等人是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重要思想家。谈论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思想,梁启超是不可绕过的一人。戊戌变法前发表的《论女学》作为其第一篇妇女问题专论,不但当年曾激起巨大回响,直接促成了晚清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女学校诞生,而且梁氏一生言说女性议题的基点亦由此确立。胡适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女人也可以学得像男人一样好”,并在其文章中倡导“男女有别,但无差别”,呼吁女性应当接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胡适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并不是自然的命运,而是被封建社会所限制的结果,女性同样应当享有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25]。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为女子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女性教育从“妻子母亲”的教育目标逐渐向“科学、民主、自由”的教育目标转变。民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也开始着手进行女子教育的改革。1927年,国民政府开始设立女子学校,并要求这些学校开设更加现代化的课程,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学科内容,如自然科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等。五四运动不仅改变了女性的教育机会,也改变了她们所学的内容和目标,女子教育逐渐从“贤妻良母”的角色训练,向学术与职业能力的培养转型。在传统的文化背景下,五四运动的性别平等观念与儒家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传统儒家思想中,女性的地位通常被视为从属于男性,女性的主要职责是家庭中的养育与辅助角色。儒家文化主张“男主外、女主内”,认为女性的教育应当限于家务技能、道德修养和家庭责任,而不需要过多涉足

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26]。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观念，挑战了这一传统观念。尤其是对于女性是否应该接受和男性一样的现代学术教育，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女性教育的过度发展可能会“破坏家庭伦理”和“影响家庭和社会稳定”。他们坚持认为，女性应当专注于家庭管理与子女教育，而不是过多地涉足公共事务和专业领域[27]。这一冲突使得女性教育的改革在初期面临了强烈的社会抵制。

在五四运动后，女子教育的文化认同发生了显著转型。从最初的“女德教育”到现代女性教育的转变，不仅仅是教育内容的变化，更是女性自我认同的变化。女性不再仅仅作为家庭的附属角色被教育，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享有自我发展的权利。教育开始注重培养女性的独立性、理性和公共意识，培养她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和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个体[28]。五四运动对女性教育的推动，促使更多女性进入大学，特别是一些女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成为女性教育文化认同转型的重要标志。女性开始接受现代教育，进入学术、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29]。然而，文化认同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在五四运动后的几十年中，女子教育依然面临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性别平等理念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仍然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改革的问题，更是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变革。在传统和现代思想的碰撞中，女子教育逐渐走向更加平等、现代化的方向，同时也经历了不断的争论、调整与适应。

1 性别平等与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冲突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在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重塑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运动中的性别平等思想也推动了女性教育的现代化，呼吁妇女摆脱束缚，走向社会 and 公共领域。然而，这一现代性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中对性别角色的固有定义之间的冲突，成为五四时期女性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传统儒家思想下，女性被赋予了“内助”角色，教育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家庭道德和家务技能的培养上，而五四运动中的性别平等观念却要求男女在社会、教育和职业上享有平等机会，这为女子教育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1 儒家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

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塑造了中国社会对性别的固有认知。在传统儒家文化中，男性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主导力量，承担外部经济与政治事务；而女性则被认为是家庭的支柱，主要负责家务、子女养育和道德教育。这一思想源自《礼记》《孟子》《大学》等经典，强调“男主外，女主内”，以及女性应当“贤良淑德，能治家务”的角色定位。因此，女性的教育内容和形式，长期局限于“女德”教育，即教导女性如何成为“贤妻良母”，以适应这一性别分工的社会需求[26]。此外，儒家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压制不仅体现在家庭责任的划分上，还通过教育内容的限制反映出来。女性教育的重点往往是道德修养、家庭管理和手工艺技能的传授，尤其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女性的受教育内容往往与“忠孝”与“节贞”相关，而很少涉及社会、政治和科学等领域。女性的教育被视为一种家务能力的培养，目的是让她们在家中扮演好妻母角色，而不是成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27]。

1.2 五四运动中的性别平等思想

清朝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压力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教育开始有了初步的起步。1870年，清政府设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标志着中国女子教育的起点。尽管如此，受限于深厚的封建文化根基，女性教育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且教育内容和形式大多限制在道德教化和家务技能上。传统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女子教育不仅受到社会偏见的压制，甚至在法律上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民国政府成立。然而，尽管民国政府曾在宪法上对男女平等作出承诺，现实中的男女教育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在这一时期，女性的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中低层次的学校中，且教育内容主要围绕传统的家政、女工技能、礼仪和道德进行，远未涉及到科学、文学、政治等领域。是故中国而不欲富强则已，如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家之兴衰存亡系焉。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女子教育的改革和推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通过思想启蒙、社会运动的广泛支持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五四运动对女性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打破了传统束缚，推动

了女子教育政策的重大改革。五四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口号，主张破除旧有的封建思想，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性别平等成为五四运动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如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等，积极倡导“男女平等”，认为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和社会发展机会。胡适在其《尝试集》中提出，“女人也可以学得像男人一样好”，并呼吁改革中国传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强调女性应当有机会进入大学、参与职业生涯，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发展[35]。五四运动中的性别平等思想，直接影响了女子教育的改革，尤其是在教育机会的普及和教育内容的丰富上。

1.3 性别平等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1912年民国政府发布的《教育总纲》提出了“男女平等，学校普及”的目标，这一纲领为女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18世纪20年代，政府开始逐步扩大对女子教育的财政投入，推动了女子教育的普及。许多城市建立了专门的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女性开始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学科和知识领域，如文学、数学、外语等。五四运动中的性别平等观念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定位发生了激烈冲突。这种冲突，既体现在思想层面的对立，也体现在教育政策和社会认知的碰撞上。在思想上，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理念与现代的性别平等理念无法兼容，社会上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与五四运动中提倡的女性解放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冲突在女子教育的改革中表现尤为突出。尽管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一批推动女性教育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物，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许多人仍然认为，女性过度参与公共事务、接受高等教育、追求职业生涯，会破坏传统家庭结构，甚至危及社会稳定。部分保守派人士认为，女性教育不应当脱离传统道德规范，女性的首要职责仍然是“持家有道、养育子女”，而社会上的男性才是“家国”的支柱[31]。在女子教育的实践中，性别平等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表现为政策执行的困难和教育内容的争议。尽管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性别平等思想提出了大胆的女性解放呼声，但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这一思想的传播受到限制。许多家庭仍然认为，女子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其成为贤妻良母，而不是追求学术成就或职业生涯。社会对女性“出世”的期望与五四运动提倡的“性别平等”观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32]。五四运动虽然带来了教育机会的改革，但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女性能否接受教育，仍然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认同以及地域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五四运动中的性别平等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较为激烈，但这一冲突也推动了文化认同的转型。在五四运动后期，性别平等思想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教育领域。女子教育开始普及，女性进入大学的数量逐渐增加，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也有所提升。这一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思想的碰撞中，经过一系列的妥协与融合过程。

2 五四运动对女子教育形式的影响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政治和思想的革命，也对中国社会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女子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对女性教育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女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逐步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家庭教育和道德教育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科学技术以及独立人格的培养。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经历了从知识获取到社会角色认同的转型，不仅在教育理念上取得突破，在实际的教育形式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1 新式女子学校的建立与教育机会的扩大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女性的教育机会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强烈制约，女子教育的内容局限于“女德”、“家政”以及简单的文艺技能。尽管一些上层家庭的女性可以接受较为系统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往往是为了让她们能够履行家庭职责，而非拓展社会领域。五四运动后，特别是1919年后，政府和社会逐渐意识到教育对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女子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五四运动的思想主张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许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开始推动女子教育改革，认为女性不应局限于家庭角色，教育应当面向社会，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这一时期，许多新式女子学校应运而生，它们的设立，不仅为女性提供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女性人才，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28]。新式女子学校的设立，增加了教育机会。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女子的教育主要限于基础教育，且多为女性特定角色的培养，如“女德”教育、家务管理等，而在五四运动后，女子不仅能够接受中学及以上的教育，还能够进入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

学习科学、文学、艺术、外语等课程。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历史中的重要一章，也为后来的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教育基础。蔡元培敢于突破社会传统束缚，给予了女子在国立大学里与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机会，这极大地改善了当时社会认为的“男女有别”等风气，引领社会男女平权发展。使得女子获得与男子一样的读书就学权利，甚至是男女都接受同样的课程。

2.2 教育内容的变革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男女平等”的口号，使得女性开始争取更多的教育权利，并为后来的女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女子教育普遍以“女德”为核心，教育内容通常与女性的家庭角色相挂钩。女子的教育大多聚焦于道德、节操、家政、针织、书法等内容，这些课程旨在使女性具备“贤良淑德”之品质，培养她们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而五四运动后，女性教育的内容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思想解放浪潮促使女子教育开始向现代化学科发展。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教育的内容逐步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拓展。新的女子学校开设了医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课程，培养女性成为各类社会职能中的积极参与者。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例，学校不仅开设了文学、历史和数学等传统课程，还开设了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许多女子学校开始设立师范课程，旨在培养女性教师，推动女子教师队伍的建设。新的教育内容赋予女性更多的知识技能，许多女性开始参与教育行业，不仅成为家庭教育的导师，还成为了中小学的教师，从而为女性在社会中的经济独立和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

2.3 女性教育的社会反应与阻力

尽管五四运动推动了女子教育的现代化，社会对女性教育的认知依然面临较大阻力，尤其是在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地方社会的影响下，许多人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角色应当局限于家庭。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坚持，使得一些社会群体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这些行为会破坏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一些保守家庭仍然将女性教育视为无用或不必要，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女性的受教育机会依然极为有限。即使在城市地区，许多家庭依然倾向于将女性的教育看作是培养其“贤妻良母”角色的工具，而非通过教育使女性走出家庭，追求独立的事业生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依然深深根植于许多家庭的文化观念中[22]。尽管五四运动提倡男女平等，但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女性的教育不应当与男性相同，而应当强调女性特定的家庭和道德责任。部分保守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也对女子教育的现代化产生质疑。部分保守派人士甚至主张，女性应当注重内在修养，而非追求社会职业或政治参与，这与五四运动倡导的社会变革理念发生了明显冲突[26]。这些社会反应和阻力，使得五四时期女子教育改革的推进之路充满坎坷。尽管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但五四运动对女子教育形式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一方面，五四运动推动了女性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参与，促使中国的女子教育体系逐渐向现代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从此，女性不仅可以接受到普通的基础教育，还能够进入中学、大学及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学习社会、科技、艺术等领域的知识，开始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促进了女性教育思想的转型，女性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为家庭角色服务，更是为了个人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

3 五四运动对女子教育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与长远影响

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社会政治变革的高潮，它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深刻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教育权利以及社会参与意识，推动了女性教育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女子教育不再仅仅是为家庭服务的工具，而逐渐成为女性参与社会、获得独立和自我实现的重要路径。

3.1 女子教育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五四运动核心理念之一，即倡导“男女平等”，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女性教育领域的发展轨迹。在此之前女性教育机会稀缺，尤其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教育常被边缘化，被视为提升家庭与社会地位的辅助手段。五四运动所弘扬的男女平等原则，犹如一把利剑，斩断了这一陈规陋习的束缚，为女性开辟了一条通

往广阔社会的道路。女性不再被简单地定义为“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被重新定义为拥有独立人格和社会贡献价值的个体。五四运动后，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女性不仅得以享受更为广泛的基础教育资源，还逐渐迈入了高等教育的大门。特别是一系列新式女子学校的涌现，为女性教育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8]。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女性社会地位显著提升，尤其是那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开始在社会各个领域内扮演更加多元化的角色。她们纷纷踏入政府机关、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公共领域，担任教师、护士、医生等职务，这些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社会角色分配[32]。五四运动明确了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推动了女性教育从家庭角色的培养转向社会角色的塑造，这一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女性教育。五四运动提出的“男女平等”，为现代女性教育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性别平等的重视。

3.2 女子教育与女性思想觉醒

五四运动不仅重塑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更在思想层面点燃了女性自我觉醒的火花。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框架下，女性往往被塑造为“温婉贤淑、柔弱顺从”的形象，其教育内容大多聚焦于家庭管理与道德规范，而五四运动如同一股清新的思想洪流，为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与解放。新文化运动高举理性、科学、民主、平等的旗帜，这些先进理念如同一束强光，照亮了女性内心深处，促使她们开始对传统社会中的性别不公进行深刻反思，并勇敢踏上寻求自我发展与自由的征途。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众多女性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及女学生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于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革的洪流之中。她们利用报纸、期刊等媒介，发表文章，热烈讨论女性解放、教育平权等议题，逐渐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丁玲、林徽因等著名女作家、女性权益倡导者及社会活动家，不仅通过文学与艺术作品传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更通过教育事业推动女性解放，呼吁女性应追求独立与自由，成为时代的先锋[26]。这一思想觉醒的壮举，离不开女子教育的普及与内容的革新。五四运动后，女子教育逐渐摆脱了传统“家务管理”与“道德教育”的狭隘框架，开始引入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等现代化学科。这些课程不仅拓宽了女性的知识视野，更激发了她们的自主思考与创新精神。许多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开始觉醒，意识到女性不应仅仅是家庭的附属品，而应拥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能够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32]。

3.3 五四运动后的女子教育持续发展与挑战

尽管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推动女子教育改革的重要角色，并促使社会对女性教育形成了广泛共识，然而女子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却是一个循序渐进且充满挑战的过程。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一进步趋势时常遭遇传统观念的顽强抵抗。特别是在经济拮据的乡村地带，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依然稀缺，众多家庭仍将女孩的教育置于次要位置。相比之下，尽管城市地区的女性教育开始受到重视，但多数家庭仍秉持女性应以操持家务为主的传统观念，从而忽视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女子教育的普及程度与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域及社会阶层间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这种差距不仅阻碍了女子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延缓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步伐[5]。此外，尽管五四运动后女子教育逐渐迈向现代化与职业化，但在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束缚下，女性在职业选择上仍面临重重难关。她们能够涉足的职业领域相对狭窄，特别是在政府、军队及科学技术等关键领域，女性的身影依旧稀少。尽管有部分女性开始涉足教育、医疗等领域，但这些职业往往仍被视为“女性专属”，而男性则更容易进入那些收入丰厚、地位显赫的行业[31]。尽管如此，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女子教育改革在面临重重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女性教育的长远发展铺设了基石。随着运动的深入，女性教育逐渐从单纯的知识获取转变为对社会角色的认同与接纳。众多女性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自我教育与独立，她们通过报考国家公职、加入社会组织、投身文化与艺术创作等途径，逐步在社会中赢得更多的权利与话语权[33]。五四运动不仅革新了女性教育的内容，更为女性参与社会事务与自我表达开辟了全新的舞台与机遇。

4 结语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解放里程碑，深刻影响了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尤其在性别平等领域，其影响尤为显著。这场运动不仅提升了女性社会地位，更是对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发起了有力挑战。尽管五四运动提出了男女平等的理想，推动了女性教育的普及和地位的提升，但性别平等的实践之路仍布

满文化抵抗和社会障碍。五四运动通过传播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明确提出了女性应与男性享有平等教育权和社会地位的主张，为女性争取平等开辟了道路。然而，这一理论遭遇的文化冲突与现实挑战却异常复杂。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性别分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被视为辅助性的、次要的，儒家文化更是强调女性应遵守“三从四德”，其教育旨在更好地履行妻母职责。这一观念长期压抑了女性的社会身份和教育机会[34]。

五四运动后的性别平等理念，尤其是女性教育权利的倡导，与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发生了剧烈碰撞。它推动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和公共生活中去，女性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女子中学和大学的开设，为女性提供了更多教育机会，使她们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获得更多参与权，推动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女性，开始在文学、教育、医疗等领域崭露头角，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33]。然而，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并未因此完全消失，反而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深深扎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一些保守家庭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较低，教育机会仍然有限。许多家庭仍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是照顾家务，而非参与公共事务；一些男性依然坚持“男女有别”的性别分工，认为女性的教育和社会参与不应过多[30]。此外，尽管五四运动带来了女性社会认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在职场和政治领域，女性仍面临性别歧视，高层管理职位和政府领导岗位上的女性参与度仍然较低。虽然女性在教育领域取得了相对进步，但性别差异在职业发展、薪酬待遇、社会认可等方面依然显著[22]。真正的性别平等，不仅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需社会文化的持续变革。在现代社会，实现性别平等仍是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它要求我们不断挑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推动性别认同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进步。五四运动虽为女性教育和性别平等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仍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时间的积淀。

基金项目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2023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荀子思想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项目编号：2023JG206）及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2024 年“揭榜挂帅”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思政一体化研究”（项目编号：CSD24-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邓小南.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现代化[M].三联书店, 2011.
- [2] 周策从.五四运动史[M].台湾明报出版社,1984.
- [3] 赵宏杰.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M].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4] 张琛,袁熙旻.性别的革命: 中国女性与近现代文明的演进[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5] 周晓萌.五四运动后的性别平等与社会变革[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6] 朱伟、李洁.现代女性教育思想的演变: 从“五四”到当代[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2), 56-64.
- [7] 何玮.中国近代家庭观的建构与女子教育——以《妇女杂志》征文活动为中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7.DOI:CNKI:SUN:HDSO.0.2012-03-007.
- [8] 陈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24-12-16].
- [9] 杨义.“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J].文学评论, 1999(3):13.
- [10] 徐芳.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之“贤母良妻”观的现代性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4, 13(4):5.
- [11] 梁妍.近代女子学校教育发展历程及特点分析(1840-1919)[D].吉林大学 2024:12-16.
- [12] 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 2010(5):14.
- [13] 张磊.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9.
- [14] 畅引婷,许英,邸晓星.社会性别观念与妇女地位的关系探讨[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1(4):5.

- [15] 雷良波.试论五四时期女子教育的模式[D].华中师范大学,2002.
- [16] 王晓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议题论争研究: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D].南京师范大学 2024:12-16.
- [17] 李维武.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J].学术探索, 2011, 000(004):77-88.
- [18] 刘方.《妇女杂志》女性观研究[D].吉林大学,2013.
- [19] 王璐.教育现代化中的性别与文化:五四运动对女性教育的影响[J].现代中国教育史,2017(4):90-102.
- [20]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6.
- [21] 冯铁江.从“女德”到“性别平等”: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历史变革[J], 中国教育史研究,2013.
- [22] 周晓萌.五四运动与中国女性教育的初步探索[J].历史教育研究,2017.
- [23] 李学勤.五四运动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4] 张颐武.五四运动的文化学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 [25] 陈独秀.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26] 唐君毅.儒家文化与性别差异[J].文化与性别, 2003(1): 44-53.
- [27] 蔡东杰.性别平等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以五四运动为例[J].社会科学, 2011(8): 18-26.
- [28] 陈忠春.五四运动与女性教育的革新[J].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4(5): 17-25.
- [29] 张华.文化认同与教育:五四运动中的女子教育改革[J].文化与教育, 2016(2): 40-50.
- [30] 王子璇.性别与社会:五四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31] 沈阳.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观念与现代社会性别平等的张力[J].性别与社会, 2012(6): 29-37.
- [32] 李慧敏.五四运动与女性教育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 [33] 李慧敏.从“贤妻良母”到现代女性角色:五四运动对女性教育认同的塑造[J].社会与文化, 2018(4): 22-31.
- [34] 赵宏杰.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M].北京:中华书局, 2015.
- [35] 胡适.尝试集[M]. 1919.